



第 22 期（总 22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2015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 北京大学雄霸榜首	4
北京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科研进展和招生工作等情况	6
北京大学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 周年暨表彰大会	8
教育部关工委、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在北大揭牌	11
“国家的远见”——2015 中国未来经济论坛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观察报告会举行	13
首届国际瑜伽日暨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开幕活动举行	15
北京大学召开《首都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	16
14 年跨越万里路 天山牵手未名湖——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	19
大力推动深圳北大市校合作 促进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21
美国科维理基金会主席一行访问北京大学	23

■ 网教之声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成果发布 十大创新教学模式亮相	24
移动互联网蓝皮书：移动媒体发展面临 5 大趋势	27

■ 北大人物

大师的教书生活：顾颉刚，在风雨中漂泊	30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33

■ 学者谈读书

北大三代人的青春阅读 ----- 37

陈嘉映：写书这事儿我走了很大弯路 ----- 44

■ 好文共赏

李猛：人文教育要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好人难且值得（二） ----- 50

■ 史苑钩沉

金克木：缅怀落叶 ----- 54

■ 大美北大

燕园花事 昼颜 ----- 59

■ 学员心声

北大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 ----- 61

编辑寄语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个时候，很多毕业生都有一个期待，就是到北大来参加毕业典礼。从去年开始，在院领导的多方努力下，现代远程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可以和在校本科生一起参加毕业典礼，这也成为众多毕业生的心愿。因为名额有限，只能选取最优秀的毕业生来参加这一仪式。本期学员心声，选取的就是一个希望来到北大参加毕业典礼的学员写的文章，回顾自己四年的学习历程与收获，与同学们分享。

下一期燕园网讯出毕业返校专刊。随后就要和大家告别一段时间。下个学期再见！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鹏、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吴晓风、李文文

新闻动态

2015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 北京大学雄霸榜首

名次	学校名称	所在地区		得分	2015 综合排名		
		地区	排名		全国排名	星级排名	办学类型
1	北京大学	北京	1	100.00	1	6 星级	中国研究型
2	清华大学	北京	2	97.16	2	6 星级	中国研究型
3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3	80.04	5	6 星级	中国研究型
4	复旦大学	上海	1	77.86	3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5	武汉大学	湖北	1	74.93	4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6	南京大学	江苏	1	74.52	8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7	吉林大学	吉林	1	72.64	11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8	浙江大学	浙江	1	72.53	6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	68.60	9	6 星级	中国研究型
10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	68.53	7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11	南开大学	天津	1	68.42	13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12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湖南	1	68.37	10	6 星级	中国研究型
13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4	68.31	12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14	中山大学	广东	1	67.55	14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15	四川大学	四川	1	67.35	15	5 星级	中国研究型

中国哪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最高？
哪所大学毕业生质量最好？哪所大学校友最牛？

2015 年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已陆续公布，考生如何科学填报志愿、挑选适合自己职业规划的大学和专业至关重要。为了给 2015 年全国高考的考生、外国留学生看就业挑大学选专业提供权威参考指南，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最新公布《2015 中国大学教学质量评价报告》，

发布最新 2015 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排行榜、2015 中国大学教师水平排行榜、2015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2015 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和 2015 中国考生最青睐大学排行榜等榜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雄居 2015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前 5 强，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最高的

大学，也是 2015 全国各地优秀考生的首选大学。

毕业生质量体现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看其职场表现和社会评价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毕业生是大学的“终极产品”，毕业生质量是检验一所大学办学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体现的是一所高校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教育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理想信念。艾瑞深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指出，21 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完成了“精英教育”阶段跨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的战略转型，研究型、专业型、应用型和技术型大学都肩负着培养社会发展亟需的高素质合格人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高层次优秀人才的双重任务。实践证明，毕业生质量关键在于用人单位和社会的评价，毕业生是否合格？是否优秀？是否杰出？关键要看其毕业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50 年后，职业成就是否得到世界、国家、民族、社会和业界的认可。理论研究和客观事实均表明，新生入学分数、高校毕业生人数、毕业生就业率、毕业生学历、教师学术水平等指标都无法真实、客观、科学、公正地反映大学毕业生质量，更无法体现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毕业生中世界、国家和社会认可的优秀、杰出和顶尖人才的多少是评价一所大学教育教学质量、毕业生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最准确、最可信、最科学、最公正和最客观的指标。艾瑞深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指出，2015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依据中国大学培养和造就的世界、国家、地区的政界、商界、学界、文体界、慈善界等领域顶尖、杰出和优秀人才等情况综合评价得出，旨在为 2015 年全国高考、考研的考生提供权威报考指南，同时纠正目前某些评价中存在的错误毕业生质量评价观念和伪科学做法。与其他大学排行榜不同是，毕业生人数、学历高低等规模指标未纳入评价标准，评价数据全部采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公布的数据，未采用缺乏公信力、透明性、客观性、学界不认可的“自建数据库”指标数据。

北京大学校友最牛，雄居 2015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榜首

大学牛不牛，关键看校友。报告显示，在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 2015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中，北京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最高、毕业生质量最好、毕业生校友最杰出，得分 100 分，高居 2015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 500 强榜首，

连续3年问鼎冠军；清华大学97.16分，居第2；北大清华是中国目前毕业生质量最高和毕业生校友最杰出的中国顶尖学府。中国人民大学80.04分，名列第3；复旦大学77.86分，居第4；武汉大学74.93分，列第5；南京大学74.52分，居第6；吉林大学72.64分，列第7，浙江大学72.53分，居第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8.60分，列第9，上海交通大学68.53分，居第10。

名列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5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前二十的其他大学依次是南开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艾瑞深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指出，从上榜高校的类型和层次来看，北大清华等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质量、毕业生社会认可程度最高；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专业型大学毕业生质量较好、毕业生行业认可程度高。整体而言，应用型大学、技术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偏低，大都肩负着培养国家、社会发展亟需的高素质合格人才。

来源：人民网

编辑：江南

北京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科研进展和招生工作等情况

6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在英杰交流中心第三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教学科研、管理服务、通识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新闻社、北京青年报、北京电视台、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科学报、现代教育报、文汇报、北京考试报、人民网、千龙网等20多家

媒体记者出席发布会。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蒋朗朗主持了发布会。



发布会上，蒋朗朗首先介绍了2015年北京大学毕业典礼及相关工作。2015年毕业季，学校将启动毕业生专题网站“毕业驿站”，完善毕业离校系统，推出毕业离校移动服务终端，为毕业生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此外，北大将毕业生按省份划分建立微信、QQ等社交群，建立校友通讯网络，使毕业生能够和就业当地的校友会取得联系。学校还将组织一系列毕业季活动，如“我的北大成就”线上测试、“写给北大的三行情书”大赛、“从校园到职场”优秀校友沙龙等，毕业生们可以通过微信和邮件两种渠道报名。

北京大学将在2018年迎来建校120周年。蒋朗朗介绍说，距离120周年校庆还有三年时间，校庆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120周年校庆网站已经初步建成并上线，设有建议、申请、征集、捐赠等栏目，包括校庆咨询、继往开来、规划项目、有你有我等板块，下一步将继续改进完善。北京大学今年还拟启动校庆标识征集、校史文物征集、北大口述史研究、“我与北大的故事”征集等主题活动。

近期，北京大学涌现出一批在国际上受到广泛认可的科研成果，内容涵盖了气候环境、生物医学、智能技术等方

面，主要有：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吴凯课题组在分子分形结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自然-通讯》发表城市与环境学院李双成研究组研究成果——揭示森林对局地气候影响；生命科学学院蒋争凡、苏晓东课题组破译天然免疫重要信使分子3'3'-cGAMP的降解之谜；生命科学学院郭红卫研究组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报道植物调控基因沉默的新机制；《柳叶刀》杂志报道姜保国教授团队工作：中国交通损伤现状及救治体系；工学院机器鱼实现南极首航；朱玉贤院士课题组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发表高水平文章；田刚率先解决YTD猜想的论文在CPAM发表；Science发表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在人类干细胞衰老机理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肿瘤医院解云涛教授课题组发现乳腺癌新易感基因；《物理评论快报》发表北大物理学院重大研究成果；谢晓亮教授获颁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北京大学成功研发高性能石墨烯柔性透明电极连续卷对卷生产新工艺等。

蒋朗朗介绍说，于2001年起开设的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简称影视编导）专业，截至目前已有十届影视编导专业学生、近500人毕业。由艺术学院主办的第十届“学院奖”颁奖暨影视专业毕业作品展映十周年庆典活动于2015年6

月 12 日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多功能厅举行。

北京大学教务部部长董志勇介绍了北大本科生自主选拔测试和通识教育的概况。作为今年第一所高考后开展自主选拔测试的高校，北大在 6 月 10-11 日和 6 月 13-14 日，分别举行博雅人才培养计划、自主招生和筑梦计划的测试，成绩优异的考生将获得最低降至一本线录取的优惠政策。董志勇还介绍了三种自主选拔形式的具体情况和今年的变化，他指出，在自主选拔过程中，北大将坚持多样化、人性化的公平招生原则。

结合北大本科生教育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董志勇还介绍了通识教育改革的实施情况和下一步的改革计划。北京大学将通识教育改革作为突破口，通过建设一批高质量的通选课程，强调对经

典文本的阅读、思考和研讨，倡导在大班授课的基础上组织小班讨论，培养知识广博、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本科生。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董志勇回答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新京报等媒体记者关于招生计划、通识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问题。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 周年暨表彰大会

6 月 17 日下午，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 周年暨表彰大会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校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和在校的全体校领导出席大会。学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学校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以及参加宣誓的新党员近 1200 人参加大会。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敖英芳主持。



会议现场

朱善璐代表学校党委向全校党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达敬意和感谢，并向加入党组织的新党员表示热烈欢迎。他与大家一同回顾了党走过的94年光辉历程，以及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壮大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引，就没有北京大学与时俱进的辉煌成就；没有党中央的关怀、支持，就没有北京大学创建一流大学的崭新局面。虽然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共产党人的精气神不应该变，为了理想信念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担当甚至勇于牺牲的精神不能变！



朱善璐讲话

近年来，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群众的认可。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去年以来，学校党委开展了“深化综合改革、聚力科学发展”讨论活动；为正风肃纪、正本清源，按照上级党组织部署，学校扎实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的整改落实工作；今年，全校上下正在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大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通过扎实开展好专题教育，切实解决北大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确保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校风、学风、教风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各项工作。朱善璐代表学校党委，对党员同志们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要志存高远，无论新党员也好，老党员也好，都要立大志、立根本之志、立远大崇高之志，

真正树立并且坚守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二是要崇德修身，修身的核心是修心、修德，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三是要笃行实干、爱岗敬业、敢于担当、埋头苦干、改革创新，为加快实现几代北大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不懈奋斗。

最后，朱善璐号召全校共产党员，在即将迎来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的时刻，要有光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埋头苦干，改革创新，从严从实抓好党的建设和学校发展各项事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创建步伐，为率先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林建华讲话

林建华宣读了《关于表彰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与优秀个人的决定》，授予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党委、第一医院党委等 9 个单位“北京大学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授予尚新建、孔凡红等 10 位同志“北京大学优秀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者——李大钊奖”荣誉称号，授予刘力、王玲等 86 位同志“北京大学优秀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荣誉称号，授予刘化荣、魏丽惠等 28 位同志“北京大学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奉献奖”荣誉称号，授予邹瑞阳、杨辉等 10 位同志“北京大学十佳学生党支部书记”荣誉称号。

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陈红松，哲学系党委原书记尚新建，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本科生邹瑞阳和元培学院 2013 级本科生赵静涵分别代表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以及新党员发言。

最后，在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大学优秀党员标兵、北京大学生理学与病理学系主任王宪同志的带领下，全校 1000 余名新党员在党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在场的各位老党员也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

大会在嘹亮的《国际歌》歌声中圆满结束。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教育部关工委、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在北京大学揭牌

按 5 月 29 日上午，教育部关工委、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北京大学万柳公寓多功能厅举行。

中国关工委副主任、教育部关工委主任田淑兰，北京市关工委主任、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范伯元，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富，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副主任、北京大学关工委副主任岳素兰，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副主任张再兴、秘书长田丽，市委教育工委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丁金凤等出席仪式。出席仪式的还有哲学系教授杨辛、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山东日照山海天城建集团董事长相丰。北京大学关工委副主任、医学部关工委主任徐天民，北京大学校长

助理、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邓娅，离退休工作部（关工委秘书处）、特殊用房管理中心、哲学系、图书馆等相关单位负责人，老同志代表，学生代表等八十余人参加仪式。仪式由北京大学关工委主任、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主持。

2013 年以来，杨辛先生先后向北京大学捐赠了 148 件荷花艺术藏品。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建成了北京大学关工委“立德树人教育基地（北京大学荷花艺术藏品展馆）”。为进一步在广大青年群体中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扩大育人效果，上级教育关工委研究决定，将荷花艺术展馆建设为教育部关工委、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活动现场

杨辛先生在致辞中表示，关心下一代，德育是根本。他认为，教育基地的建设，通过艺术为媒介，把德育和美育结合起来，以美引真，以美导善，是非常生动的教育模式。杨辛先生希望青年学生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修德养性，端正品行，把荷花的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田淑兰、范伯元为“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揭牌

仪式上，田淑兰、范伯元为“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揭牌并讲话。田淑兰

在讲话中表示，以杨辛先生为代表的教育系统老同志，在离退休后，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以自己的学识和个人魅力教育和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堪为师之表率，令人无比钦佩。她指出，教育基地“以美引真、以美导善”的核心理念，是对荷花艺术藏品美育价值和德育价值的充分挖掘，也是在青少年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有之义。她强调，要将荷花文化教育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将育人基地努力建设成为学习基地、交流基地、调研基地、宣传基地和研究基地，进而为教育战线关心下一代工作提供新的工作经验。

范伯元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杨辛先生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所做的突出贡献，并对北京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给予了肯定。他指出，教育部关工委、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的揭牌，标志着北京市乃至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希望，北京大学关工委继续发挥优势，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发挥作用，引领潮流，做出表率，努力为关心下一代工作长远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吴志攀代表北大党委和行政部门，衷心感谢上级关工委的信任、指导和支持。他表示，北京大学一定不负所托，

高度重视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工作，积极探索联合莲花池公园、泰山风景区设立荷花展馆，让荷花文化进一步走出校园、融入社会，将荷花“香远益清”的精神融入到传播传统文化、引领青年成长、服务社会发展。同时，继续动员更多的师生投入荷花文化的研究，通过加强教师指导、开展交流活动、提供展示平台等方式，积极为更多的青年学生学习、研究、传播传统文化提供方便。在扩大“广度”的同时增进“深度”，切实提高育人的实效性，更好地履行北京大学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的大学使命。



山东日照山海天城建集团集团与北京大学签订捐款协议

关工委教育基地的建设得到了企业界人士的热心支持。慷慨捐资 30 万元用于基地建设发展的相丰先生表示自己深受杨辛先生高尚品格的熏陶和感染，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教育基地的各项工作。

荷花品德奖得主、数学科学学院 2013 级本科生徐芦泽在仪式上发言，他表示一定深入理解杨辛先生奋发有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坚持修己之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来回报前辈们的殷殷期许。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教育基地。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教育基地将向校内外团体开放参观。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白杨

“国家的远见”——2015 中国未来经济论坛

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观察报告会举行

6 月 25 日，“国家的远见”——2015 中国未来经济论坛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观察报告会在北京新华社大

礼堂开幕。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由新华通讯社和北京大学作为指导

机构。新华社副社长于绍良、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先后致辞。



会议现场

论坛主要分为“十三五与新常态”“创新经济与国家战略”以及“创业创新的痛点”三个环节。“十三五与新常态”环节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院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辜胜阻表示，“我们需要熊彼特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要靠企业家稳增长。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认为，中高速增长是实现平稳转型的关键，内生增长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方向，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指出，新技术、新业态、新布局的融合提供了重大机遇。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主张加快金融改革，强调“条件差不多就放开，发现问题再解决”。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最后的调整期，今明两年有可能走出最困难的局面。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提醒，中国资本“走出去”不能再走西方资本输出时只考虑利润的老路，要考虑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波首次发布了“朗润龙信创新指数”，该指数从多角度刻画一个区域的创新水平，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龙信数据联合推出。

在“创新经济与国家战略”环节，针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变革问题，本次论坛联合主办方万色城集团董事长朱海滨指出，创新工场、众创空间、车库咖啡等新型孵化器主要还是为有资源、有技术的专业人才和中小企业服务，普通大众在创业方面得到的支持很少。此外，深圳光启创始人刘若鹏、好贷网联合创始人李明顺以及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蒲宇飞也从不同角度对事关创新发展大局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创业创新的痛点”环节，北京市昌平区副区长苏贵光、一方集团总裁杨越、腾讯副总裁江阳等就创新生态的构建和创新规划的科学推进提出了独到

的见解。杨越认为国内创新体系正在从以政府为主导逐渐转化为政府与产业龙头企业、大型投资机构、产业链中介组织等创新系统的深度融合。他提出“生态系统规划”的概念，建议通过一站式

服务、定制化、信用认证等促进创新企业的快速成长。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首届国际瑜伽日暨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开幕活动举行

6月21日上午，“全世界遇上瑜伽——首个世界瑜伽日庆祝活动暨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开幕活动”在北京大学五四体育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印度驻华大使馆、北京大学及“生活的艺术”瑜伽工作坊联合举办，来自校内外近五百名瑜伽爱好者共聚一堂，一起在交流与学习瑜伽中庆祝第一个国际瑜伽日，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拉开了序幕。

印度驻华大使康特（Ashok K. Kantha）、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代表苏凯琳（Catherine Sozi）、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以及“生活的艺术”基金会中国区负责人余勤丰出席了活动并讲话。康特表示，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练习瑜伽，他希望中国成为瑜伽的第二故乡。李岩松说，早在2003年北京大学就成立了印度研究中心，北大也一直致力于促进与印度的文化教育交流，他希望中印青年通过瑜伽追求健

康、和平与发展。余勤丰则表示瑜伽已经成为解压、健康、快乐、以及创意的代名词。



活动现场

开幕式后，参加活动的人们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共同学习瑜伽的基本动作、静心技巧，还一同体验了难得一见的印度呼吸方法。活动中，大家体验了身体放松带来情绪上的平静，随之而来的深度休息体验也让大家感受到了瑜伽的独特魅力。



背景资料：

2014年9月27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年度大会上提议设置“国际瑜伽日”。之后，印度向联合国提交了国际瑜伽日决议草案，得到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家的支持。当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6月21日为“国际瑜伽日”。

瑜伽运动，发端于古印度文明，是追求身体、心灵与精神和谐统一的养生方式与人生哲学，包括调身的体位法、

活动现场

本次国际瑜伽日庆祝活动，有助于北大师生了解瑜伽的养生智慧，深入体会这种印度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进一步促进中印教育文化交流。（文/柳美娜）

调息的呼吸法、调心的冥想法等，以至身心的合一。

瑜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及“阴阳平衡”的概念，有着共通之处。今年5月，莫迪总理访华期间与李克强总理一同出席“太极瑜伽相会——中印文化交流活动”，两种具有悠久历史的锻炼形式在这里形成了极好的辉映。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北京大学召开《首都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

《首都发展报告》（2015）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编著，是首部全面反映首都发展现状、规律与趋势的综合性研究报告。

2015年5月22日下午，“新常态下首都发展战略研讨暨《首都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科学出

出版社联合举办。北京市委办公厅、市委研究室、市委宣传部分、市发改委、市社科规划办、市社科联，以及清华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新常态下首都发展战略研讨暨《首都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现场

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秘书长杨开忠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对各位与会来宾表示热烈欢迎。杨开忠教授指出，新时期国家对首都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都发展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则给出了积极回应。



北京大学秘书长杨开忠教授介绍《首都发展报

告》(2015)

《报告》总体精炼概括，系统性较强，对当前首都发展面临的形势进行了真切分析；《报告》还对首都发展提出了七大对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and 意义。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张庆玺主任充分肯定了北京大学以及由李国平教授带领的首都发展院研究团队的工作，张庆玺主任还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这项意义重大的研究工作。

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张小凌也表示，科学出版社将继续积极与首都发展研究院合作，进一步加强首都相关的长期性、战略性、基础性的研究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

北大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首都发展报告》(2015)主编李国平教授系统介绍了本报告的编著过程和主要内容。



北大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首都发展报

告》(2015) 主编李国平教授

《首都发展报告》(2015)分为总论篇、综合篇和专题篇。总论篇通过分析新常态下首都发展的三大形势和四大问题,提出了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打造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实施人口总量有序管理、推动和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加快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促进首都北京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七大策略。

综合篇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保护、城市空间发展布局等方面,对首都北京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专题篇由《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政策研究》和《资源和人口约束下产业结构调整分析》两个专题构成,提出了首都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措施和资源、人口双约束下的细分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

北京市委研究室副巡视员余钟夫、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施祖麟、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张强等专家学者对《首都发展报告》(2015)的出版表示祝贺,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对报告中涉及的主要观点展开了讨论,

并就新常态下首都发展战略以及《首都发展报告》(2016)的编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有专家建议,《首都发展报告》参考世界银行年度报告的形式,以年度主题形式每年进行发布。

北大社科部副部长耿琴回顾了首都发展研究院16年来的发展历程。《报告》的出版是首都发展研究院以往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首都发展研究院应坚持为首都发展提供高端的、学术性的,且为决策服务的科研产品,努力打造成为为首都服务的新型智库。

此外,与会的北京市相关委办局领导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暨《首都发展报告》(2015)的发布表示祝贺,并表示将进一步支持首都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智库建设。

《首都发展报告》(2015)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编著,是首部全面反映首都发展现状、规律与趋势的综合性研究报告。该报告是在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首都发展规律及趋势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旨在客观、全面、系统描述首都发展现状,分析发展规律和趋势,为制定新时期首都发展战略,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十三五规划提供智力支撑。(采编/中国网记者 毅鸥)

原标题：《首都发展报告》（2015）：

来源：北大新闻网

提出首都发展七大对策 中国网

编辑：江南

14 年跨越万里路 天山牵手未名湖

——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

14 年前，教育部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确定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两所相隔万里的高校从此牵手同行。14 年后，两校在各领域合作已结出累累硕果。记者走访发现，在北京大学持续支援下，石河子大学已从一所普通的边疆大学迈向 211 重点高校，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半学生扎根边疆 援建溢出效应明显

多年来，石河子大学担负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才库、思想库”的重要任务。记者在这所拥有 65 年历史的学校看到，近 200 万平方米的校园开阔严整、绿树成荫。

石河子大学对口支援办主任雍会向记者细数学校近年来的变化：过去，学校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为零，科研经费每年不到 2000 万元；如今，博士点增加至 5 个，科研经费已连续四年超过 1 亿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数和总经

费连续三年名列新疆首位。2008 年，石河子大学成为 211 重点高校。

“2001 年以来，北大从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合作、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开展援建工作，为石大跨越式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科研实力迅速提升。”他说。

据了解，在北大支持下，石河子大学科研项目近年来逐渐增多，与北大联合申报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 计划等 10 多项国家重大项目。而受北大援建工作带动，越来越多内地学生也选择到石河子大学就读，一系列社会效应正辐射溢出。

石河子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张小宾告诉记者，目前学校毕业生本科就业率已连续 12 年保持在 90% 以上。2002 年以来，每年超过一半的毕业生选择扎根新疆基层，近 60% 的内地生源毕业生志愿留疆，“他们正成为新疆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

此外，为发挥高校在中亚问题研究及“一带一路”战略上的智库作用，由北大、石河子大学牵头，国内部分高校及研究机构合作下，兵团屯垦戍边研究中心、中亚文明与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也在石河子大学相继成立，为新疆兵团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打通支援“绿色通道” 搭建“名师”共享平台

在石河子大学校园的草坪上，矗立着北大优秀援疆教师孟二冬的雕像。学生们至今仍在深深怀念这位因喉癌去世的恩师。

“孟老师在严重病痛时还坚持频繁上课，边咳血边给我们讲，说不出的时候就写在黑板上，很多课我们真是含着眼泪听完的。”石河子大学的学生回忆说。

近年来，为提升石河子大学人才质量，北大通过实施“文化西援”工程、“名校名师讲坛”、开通网络精品课程选修等，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以名师讲学、优质课程、优质教材惠及边疆师生。

韩启德、许智宏、柯杨、黄楠森、厉以宁、刘意青等 200 多名北大知名专家、院士纷纷来到石河子大学支教、讲学，开展讲座达 300 多场，内容涉及各

学科领域，听讲师生达 4 万多人次。

在石河子大学，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对这批学养深厚、品德高尚的北大教师感激不已。援疆教师中有的年过七旬仍不畏劳苦，远赴边疆；许多人放弃休假，来石大免费授课；有的将个人积蓄和讲课所得全部拿出，捐给困难学生。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臧红宝感慨地说：“北大老师们留下的是高屋建瓴的思想和理念，让我们看到山顶的风光，也看到老一辈教育家身正为范、学高为师的风范品德。”

让教师“走出去”服务边疆的同时，北大也把边疆学子“接进来”，每年安排至少 10 个石河子大学的本科生到北大插班培养，让他们感受名校氛围，开拓眼界。目前，到北大插班学习的石河子大学学生已超百名。

多方提升“造血”功能 增添发展内生动力

资源欠缺、人才引进难、科研能力弱一直是制约西部高校发展瓶颈。为了不让对口支援“人走茶凉”，北大着力提升石河子大学“造血”能力，为学校可持续发展增添内生动力。

正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教师吴新锋就是对口援建的直

接受益者。2006年，刚从石河子大学毕业的他被推选到北大中文系攻读民间文学的硕士学位。学成回校后，他开办了石河子大学首个民间文学课，广受学生欢迎，并建立了新疆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为给石河子大学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学术科研骨干，14年间，北大共接收了石河子大学500多名教师、管理干部到学校交流学习，并于2004年成立“新疆研究生培养基地”，每年拿出10个博士指标，计划为石河子大学培养100名博士，充实其高水平教师力量。

如今，吴新锋等65名石河子大学青年教师已成为北大博士研究生，其中31名已学成回校。“这批到北大进修和博士毕业的教师现已成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没有北大，发展不可能这么快。”石河子大学党委书记何慧星认为。

近年来，北大先后选派了十多名干部在石河子大学挂职副校长及相关学院

和部门负责人，帮助石河子大学提升科研和管理水平。2006年，北大教授于鸿君在石河子大学挂职副校长，他结合新疆地域优势，带领学校教师精心准备，首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最终获批立项，实现了新疆和西北地区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零的突破。

北大援疆干部、石大党委副书记夏文斌认为，教育援疆是实现国家战略、缩短中西部发展差距，特别是促进新疆稳定发展的最好载体。“如何减少教育领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盘活教育‘一盘棋’，畅通优质资源和人才向西流动，拉动西部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北大和石河子大学这些年做出了有益探索。”（新华社记者任卫东、魏梦佳、乌梦达）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大力推动深圳北大市校合作 促进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13日晚上，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马兴瑞，市长许勤会见了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一行。双方表示，在新时期，市校紧密携手、优势互补，探索共建高水

平、有特色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合力推动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共同为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作贡献。

马兴瑞对林建华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北京大学以及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长期以来在人才、智力、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深圳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经过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特区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寄望深圳在“四个全面”中创造新业绩，推动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省委也对深圳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不久前召开的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勇当“四个全面”排头兵、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奋斗目标。他表示，北京大学历史悠久、师资雄厚、学科建设有特色、人才培养能力强，拥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希望北大在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支持深圳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学和研究生院。深圳市也将为

北京大学在深圳的建设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

林建华对深圳一直以来给予北大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北大本部以及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创新发展情况。他说，北大和深圳市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在深圳勇当“四个全面”排头兵的新时期，北大将全力支持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他强调，大学建设要充分考虑国家和地方的需求，学科设置要突出前沿特色和国际化特点，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推动深圳高等教育水平实现新提升。

市领导张虎、郭永航、吴以环，北京大学有关负责人高松、海闻、吴云东等参加了会见。

原信息来源：《深圳特区报》（2015年6月14日 第01版）

原标题：马兴瑞许勤会见北大校长林建华——大力推动深圳北大市校合作促进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美国科维理基金会主席一行访问北京大学

6月10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王杰在办公楼亲切会见了来访的美国科维理基金会（Kavli Foundation）主席 Robert Conn 教授和主管科学事务的常务副主席 Miyoung Chun 博士。双方对共建的北京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近年来呈现出的良好发展势头表示满意，并就今后双方对该研究所提供更多的全面支持达成了共识。会见后，Robert Conn 教授向林建华赠送了科维理基金会纪念章。



Robert Conn 教授向林建华赠送纪念章

6月8日，科维理基金会主席一行到

访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对北大教育基金会多年来帮助运行、管理科维理投资基金表示感谢，并对今后双方更好地加强合作进行了交流。

6月6日，王杰在办公楼会见了科维理基金会主管科学事务的常务副主席 Miyoung Chun 博士和 Christopher Martin 博士，就成立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所国际理事会等相关事项进行了交流。

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所所长何子山、副所长吴学兵陪同会见。

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所是北京大学和美国科维理基金会合作，于2006年6月成立，2007年正式运行。研究所致力于建设一个国际一流的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中心。科维理基金会在全球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捐资建立了17个研究所，在天体物理、理论物理、纳米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开展基础研究。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网教之声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成果发布 十大创新教学模式亮相

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于6月23日上午在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行了教育部-英特尔信息技术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成果发布会,来自国内外高校、中小学和教育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的30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发布会。

国内外专家共同完成研究内容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由中心副主任黄荣怀教授牵头,联合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以及50多位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印度、韩国、阿拉伯联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共同完成。2014-2015年度“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确立的研究重点是国内外教育信息化比较研究,即从不同的研究范畴包括硬件建设、资源建设、教学模式创新、学习环境构建、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等方面分别开展

国内外对比研究。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媒体联盟、美国K-12在线学习国际组织、智慧学习环境协会等国际组织和协会的广泛交流与协作,从多个维度对典型地区和项目分析其发展策略、建设成效、推进模式和运行机制,分析总结出各国家、地区的先进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结论,以期对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三大研究成果9月出版

发布会上,黄荣怀教授代表项目团队发布了三大研究成果,即中文著作《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14-2015)》和《国际教育信息化典型案例(2014-2015)》,以及英文著作《ICT in Educational in Global Context: Comparative Reports of Innovations in K-12 Education (2014-2015)》。中文著作将于今年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出版,英文著作将于今年11月份由Springer出版集团出版。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2014-2015)》面向教育管理者，对2014-2015年全球教育信息化动态做了综述与分析，包括“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教育教学创新与实践的国际比较研究”、“数字资源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学习环境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和“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师专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五个研究专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总结分析各国家、地区的先进经验，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作为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组总结提出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十大研究结论，即：(1) 建设与应用教育云平台，实现共享服务是全球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势所趋；(2) 信息化学习终端逐步多元化，应用前景甚好；(3) 新型教学方式成为助推教育教学创新的重要引擎；(4) 互联网支持下的微型优质资源促进教学方式的深层变革；(5) 建构数字资源内容、智能工具以及支持服务一体化体系是各国数字资源建设的发展趋势；(6) 国家、企业、学校均以不同角色参与数字资源建设，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数字资源；(7) 学习空间布局逐渐由单一形态的普通教室转型为多功能、多形式的学习区；(8) 针对不同人群的虚拟学习空间呈现出特色发展的趋势；(9) 需

求导向的培训体系是各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的重要抉择；(10) 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将成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教育信息化典型案例集(2014-2015)》收录了来自亚太、北美、欧盟和中国的教育实例。主题涉及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学习与空间建设、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精选的国外案例强调国际代表性和引领性，国内案例强调普适性。案例分析注重发现规律，预测趋势，以期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借鉴。

《ICT in education in global context : Comparative reports of innovations in K-12 education》主要面向国际读者，邀请zhuan 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技术领域国际知名专家，针对中小学教育创新应用，通过比较世界各国不同的 ICT 创新应用研究，展示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包含中国)在不同国情及文化下，应用 ICT 有效促进教与学的实例。全书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创新的教学模式；第二部分讨论学习设计的方法；第三部分讨论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发展模式；第四部分讨论利用 ICT 促进数字化领导力和教

师专业发展。

“十大信息技术支持的创新教学模式”发布

本次发布会另一重头戏是黄荣怀教授发布的“十大信息技术支持的创新教学模式”。该成果是项目组从学习方式、教学方式、学习内容及学习空间等四个维度，对 120 余个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以“有理念、有情境、有模式、有成效、有证据”为标准遴选出来。这些模式都具有创新的教学理念，指向教学实践问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操作流程，在国际和国内均有案例作为证据，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显著的教学效果。十大信息技术支持的创新教学模式包括：(1) 远程专递课堂——为帮助偏远地区和落后学校的学生享受优质教师资源，实现教育均衡发展。远程专递课堂为薄弱学校因缺师少教而无法开齐国家规定课程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2) 网络空间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限制，将线上学习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并利用碎片时间，促进教与学、教与教、学与学的互补；(3) 异地同步教学——以网络直播为主，在两个教学条件相当而教学优势互补的两个班级之间开展同步教学活动，实现校际之间、班级之间“理念共享、资源共用、优势互补、合作共

进”；(4) 双主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建立了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新型教学结构(双主教学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从而使培养大批创新人材的素质教育目标真正落到实处。(5) 翻转教学——对课内课外时间如何运用进行重新安排，从而把学习主动权从教师转移到学生；(6) 校园在线课程——学校通过开发或选用符合本校传统和优势、学生兴趣和需求的在线课程，并将这些在线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数字化学习体验；(7) 基于设计的学习——作为创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设计能力，体验和优化 STEAM 教育的教学过程；(8) 引导式移动探究学习——不仅支持学生通过移动设备在课堂上开展内容探究，也支持学生在非正式学习情境(如博物馆、科技馆、生态园等)中开展探究学习；(9) 协同知识建构——作为小组协作学习的一种典型形态，师生或学生之间通过交流对话而产生新知识，能够促进高阶认知能力的培养；(10) 能力导向式学习——该种模式采用全自主、能力导向的方式，不进行分科教学，围绕学生

所需能力图谱开展系列活动。

接下来，华中师范大学吴砥教授代表“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项目组”发布了《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14)》。“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项目，紧扣《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八大任务，从教育发展的视角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教育管理信息化的发展状况和教育信息化的共性问题即教育信息化公共支撑环境、人才队伍建设和体制机制建设这八项主要内容作为发展报告的主体框架，结合教育部正在推行的“三通两平台”进展情况，并重点分享了各级各类教育信息化典型案例以及教育信息化热点问题，《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14)》反映了我国教育信息化近一年的发展情况，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支持和参考。

发布会期间，来自教育部科技司副

司长雷朝滋先生、英特尔中国区企业事务部总经理朱文利女士、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黄永林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陈丽女士先后对本次成果发布会致辞。雷副司长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教育信息化已在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进入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然而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导致的教育公平问题，成为了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难题和瓶颈，希望高校的专家和教授们要继续发扬合作精神，通过不懈的努力，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所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希望 Intel 公司继续给予项目大力支持。

来源：腾讯教育

编辑：丁香的耳朵

移动互联网蓝皮书：移动媒体发展面临 5 大趋势

6月24日，《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5》(蓝皮书)在京发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撰写《移动媒体的创新线索与发展趋向》

一文指出，从近期的趋势来看，中国移动媒体的发展将在以下五个方向深化。

一是新闻客户端社交化的深化。今天的新闻客户端，基本还是门户网站思

路的延续。虽然嵌入了一些社交元素和个性化元素，但社交仍是附属品。新闻客户端也“继承”了门户网站的超载与同质化问题。尽管一些客户端在采取技术过滤的方式来提供更个性化的信息，但技术的过滤总会有其局限性。而社会化媒体早已经通过社交关系网实现了信息的过滤功能。如何将社会化媒体的底层结构与新闻客户端的内容架构进行嫁接，将是新闻客户端创新的方向之一。

二是 UGC 和众包式生产模式的升级。目前移动媒体的 UGC(用户生产内容)生产仍然有限，但简单地把 UGC 填塞进 PGC(专业生产内容)中，未必能产生好的结果。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多地要探索将 UGC 转化为 PGC 的途径与机制。

三是“自媒体”的部分专业化。2014 年，新浪微博“自媒体”计划的推出，意味着自媒体的“进入”有了更高的门槛。而以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的“头条号”等方式出现的自媒体，虽然门槛相对不太高，但是要能坚持下来，必定靠较高的专业水准。

今天的自媒体，已经不再是“个人媒体”，即使没有专业媒体背景，自媒体也越来越多地靠团队的方式来完成。自媒体在今天正在变成专业媒体人转型的一个方向。这种转型，并不仅仅只是

脱离体制拉起自己的一帮人马这样一种外在形式的变化，而更多的是传播语态与传播模式的转变。

四是入口向平台转化的加速。移动环境下的内容、关系、服务三者的交融，使移动媒体的平台化成为趋势。平台化，也是提升移动媒体营利能力的基础。一个新媒体平台，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与一个产品只是在单一环节提供单一功能的满足不同，平台应该涵盖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更多环节，提供综合的服务。

其次，平台的生产主体是开放的，平台也是由所有生产主体共同经营的。一个良性的平台生态决定了这个平台上不同的生产者的积极性与贡献度。

第三，平台是产品的孵化器。平台需要为新产品的开发提供用户基础以及开放的技术接口。

更重要的是，平台不只是各种产品的集合，而是以用户为核心、围绕用户的需求而形成的一个有机体系。一个平台的理想目标是构建合理的生物链条和平衡的生态系统。

五是服务媒体的兴起。移动媒体不等于新闻客户端，它将具有内容媒体、关系媒体与服务媒体三种不同取向。前两者今天已经成熟，而服务媒体将是未

来的一个发展趋向。

服务媒体将源于两种可能：一是今天的内容媒体在服务属性上的强化，或与服务平台的连通、融合。垂直媒体未

来的深化方向，也将是和服务平台的打通。二是今天的服务类客户端的媒体化。

来源：环球科技

编辑：丁香耳朵

■ 北大人物

大师的教书生活：顾颉刚，在风雨中漂泊

“读书种子”的家庭烦恼



1893年5月，顾颉刚出生于文教胜地苏州，祖上曾被康熙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家境虽已萧条，但门风犹在。顾颉刚上私塾、念小学时传统文化功课皆堪称优秀，后去苏州念中学，又结识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学问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顾偏重于经史，与叶、王略有差异），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及至1916年秋，考入北大中国哲学系，成为同学中的俊秀等等，亦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北大，顾颉刚遇见了日后携手在学界打天下的傅斯年、罗家伦。傅、罗乃新一代北大学子的领袖，傅在国文系，罗在外文系，相似的功底与才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教师当中，顾颉刚最欣赏的则是胡适。而胡适能得到顾颉刚的欣赏更是幸运。

当时胡适初来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其授课水平并不能镇住台下一帮旧学功底深厚的学生，大家第一次听课，竟想把他轰走。多亏顾颉刚觉得胡适的旧学功底虽然比不上前任教授，却有一套做学问的新思路。顾又叫傅、罗来听课，他们也觉得胡适是位良师。胡适这才站稳了讲台，并在顾颉刚等人的“压力”下埋头做了几年学问。

按理说，有这么好的师友关系，顾颉刚该可以尽情享受求学生活的快乐。可事实上已经成婚的他有许多烦心的事。1917年妻子生完次女即患病，接连两次生男不成的她在顾家连起码的人道待遇都得不到。放假回来，颉刚见妻子已是病入膏肓，反复恳请长辈安排治疗

均被拒绝。返校后他无心求学，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只得休学回家。

不久，妻子去世，入殓后第二天，急盼延续香火的长辈便催他赶快续娶。顾颉刚念及养育之恩未报，经济又不独立，叹自己无法摆脱家长命令，只得承受无尽的痛苦。那年9月，已在吴县小学任教的中学好友叶圣陶、王伯祥邀请他前往游玩散心，并在那里幸运地邂逅了王伯祥的学生殷履安。

顾颉刚新婚之前，好友傅斯年、罗家伦领导北大学子发起了“五四”运动，也许是饱受旧礼教之苦，顾颉刚在家乡收到消息后立即写信鼓励傅斯年将风潮扩大，直到对腐朽的旧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但不久，傅、罗二人的政治热情便冷却了。二人领导“五四”运动出名后，谣言四起，说他们欺世盗名、收受贿赂。这一结局让他们觉得学生群体内部实在复杂，派系林立，相互攻击。他们决定从此不问外事，只钻研最靠得住的学问，以免做无谓的牺牲。

正当顾颉刚万分为难之际，罗家伦来找他了，想让他接手《新潮》杂志，并承诺替他在北大谋一职位。从未想过自己能留校的他听了既兴奋又难过。后来，欣赏顾颉刚的老师胡适出面了，他让顾颉刚做他的学术助手，每月私人补

助他30元，出路艰难的顾颉刚终于可以留在北大了。

发现史学惊天秘密

1920年秋，顾颉刚开始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一方面要逐一清理馆藏的17万册书，另一方面还要搜集民间歌谣，忙得不亦乐乎。这为他做学问打下了深厚的材料功底，再加上恩师胡适的启发与提携，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学问门道，他决定静下心来研究历代“伪书”，同时考察各类民间故事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状况。

很快，顾颉刚便取得了令胡适欣赏的成绩，胡适频频在北大文史权威教授面前夸赞顾颉刚的刻苦与才华，并带他参加学术活动，顾颉刚因此得到了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文史大家的认同，在学界的师友日益扩大。

然而顾颉刚才享受了几个月的做学问、与师友切磋的幸福时光，便接到祖母中风的消息。当时沈兼士已将他提拔进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任助教，这该怎么办？顾颉刚最终还是请长假回去尽孝了，收入也因此丧失。还好当时教育部正在实施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亟待更新，胡适给他找了份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每月有50元，大抵能解决一家的日常生计。

这样的教科书编写思路让顾颉刚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园地，心里觉得“真是无上的快乐”。更让他快乐的是，他在整理上古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从未被人揭示的历史秘密——即“尧舜禹的先后次序”问题。

一般历史书都认为，尧早禹晚，但顾颉刚考察尧舜禹话语的诞生情况后，却发现禹这个人物最早是出现在西周的文献中，而尧舜到了春秋末年的文献才开始出现，传说更早的伏羲在文献中的出现还要晚，于是他形成了日后名扬海内外的“古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位置恰好相反。西周人只知道禹，春秋末期的人创造了尧舜，并把他们放在禹的前面，传说中的上古史就这样被“伪造”得越来越长。

人们原以为确有其事的历史竟都是传说，尤其是被视为祖先的大禹都可能是假的，这样的文章当然会使顾颉刚一下子成了学界的注意对象，乃至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顾颉刚也因此突然“暴得大名”。

批判他的人自然会有许多，顾颉刚也期望见到有人能拿出确凿的史料来反对他，但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他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为了表明自己将致力于对

历史文献及话语的真伪展开严肃的考证。或者说，就自我专业的定位而言，他将钟情于一种旨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学术生活，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同仁选择这种生活，以繁荣中国学界自清中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典籍辨伪事业。

贫穷的史学新秀

那一年是 1923 年，顾颉刚正好 30 岁，好友傅斯年、罗家伦仍在海外。得知国内学界动向后，傅斯年赞叹“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然而，他在经济上却丝毫没有随暴得大名而“脱贫致富”，相反，成名后的几年倒是陷入了每况愈下的境地，就这样痛苦到了 1923 年底，顾颉刚最终还是辞职回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了。

回到北大后，顾颉刚开始了一连串的学术计划，成绩斐然，尤其是那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更是被誉为“2500 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他依然不能无忧无虑地做学问。

名气大了后，各方纷纷邀请他兼职、作文、应酬，而他因为经济问题又不得不去。在公立大学里就职长期领不到薪水，家庭生计、购买书籍和做学问均要花钱，顾颉刚因此欠下一堆债务。

其给老师胡适的一封信中就列有：欠家 700 元，欠适之 220 元，欠学校 250

元，欠同乡友人 460 元，欠储蓄会 320 元，共 1950 元。按今天的标准估算，他一年欠了 7 万元左右的债务。有一次，顾颉刚想到自己为了谋生、做学问，给师友增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回家后居然大哭了一场。

谁能想到，“暴得大名”之后的北大助教顾颉刚生活竟是如此清苦！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碧荷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1893 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代哲学家、教育家。

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 年后，应聘于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4 年辞去教职，到山东自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抗战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 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其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 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1988 年 6 月 23 日病逝于北京。

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辑有《梁漱溟教育论文集》。

中国的脊梁：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1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从他的一生来看，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羨：其一是 1916 年，梁 23 岁，当年 9 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其到北京大学任教。且当时有传闻，之前梁欲考北大而不得；其二是 1946 年国共和谈期间，10 月 10 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 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

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期间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

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丰富多彩，之所以在文章开头选取三个横断面，是因为这三个横断面分别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三十一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长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教授，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段从三十二岁(1925年)到六十岁(1953年)，在这一段生涯中，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始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到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加入新政府却拒绝之，最后则是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在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兼政治

活动家。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开始写作《人生与人心》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复归为知识分子的生涯。

《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就是集中叙述梁漱溟先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作者汪东林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政协工作，有机会亲炙梁先生身前，因此了解了许多内情，因为还没有来的及系统阅读梁漱溟先生的全集，因此不便说这本书的资料有多少是新的，多少是旧的。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只想就笔者对梁漱溟先生的思考，结合阅读的过程和盘托出，以就教于方家。

2

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说法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分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在此不说；另一方面，则是把梁先生说成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士林对梁先生“一代直声”的赞誉，当证明我的看法大致不差。我对梁先生的敬仰之心，不比时贤差到哪里，但是对于后者，却有一点自己的认识。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答案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以我一颗愚钝的心想来，这个问题其实

可以商榷。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笼统的说法叫“读书人”，学界称之为“士大夫”。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响下，才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这一概念，争论从来就没有断过。我则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且建构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虽然狭窄，但是界定起来却比较清晰，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此，梁先生自己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到，在梁先生的最后岁月里，“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按理说，梁先生没有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后来者不该强做解人，其实不然，仔细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更何况，这是在梁先生晚年复归知识分子状态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梁先生

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之时，又或者梁先生冒犯龙颜，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之时，梁先生心中，可曾想过自己的自我定位？如果想过，我想单纯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法囊括梁先生的，否则的话，梁先生也就不必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再说一点题外话，历来被士林推重的藐视权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比如说王闾运、比如说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在我看来，这都不能算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王闾运见了袁世凯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主儿，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章太炎是大学问家不假，可是他还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见了，是要忌惮三分的，所以“邹容吾小弟”死于狱中，章太炎平安无事，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就是现代教育的根基，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完成的，比如说蔡元培，蔡元培大家都比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革命党，资历深厚，在教育这个领域内，简直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面子？要说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这些人的骨气和成就是知识分子的

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对于梁先生，我也做如是想。

3

前不久，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在三联再版，我写了一篇关于冯先生的文章，把冯先生与梁先生做了一个比较，比较之下，才发现历史如此意味深长。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形状再做几个比较。

梁先生在因“九天九地”的发言而“靠边站”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遭遇，让我最容易想到的是张申府先生。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若是拿这话来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朋友，则不是那么准确。张申府的性格与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处，至少就倔强这一点来说没有问题，用张申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期认识的毛泽东，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1948年，张申府在《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明朗的局势下呼吁和平。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申府之后遭遇与这篇文章关系甚大。不过，就是在这之后的1949

年初，梁漱溟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国民党》两篇文章，似乎，梁漱溟没有因为这两篇文章遭受什么“特殊待遇”。从一些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与他的这位顶头上司相处得并不是那个融洽。卑之无甚高论，至少我觉得，这样的比较，是看到梁漱溟和张申府相同性格不同遭遇的一个角度。

过去有位朋友跟我说：你写文章不要总是罗列史实，你要说出你的观点。我说，历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观点的泥淖。看看历来被士林传颂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气”，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相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张申府，你得承认，梁先生这样的骨气，背后是需要底气的。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碧荷

学者谈读书

北大三代人的青春阅读

编者按：我们采访北大三代人，走进上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和当前北大学子的青春阅读生活，希望通过这种代际传承来反映阅读对人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阅读本身和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微妙关系？阅读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并希望借这组报道，向“五四”青年节致敬，向不断追求进步、热爱读书的青年致敬。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77 岁；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47 岁；
张一帆，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22 岁。

“阅读”三代人的青春阅读生活，如同展开一本散发墨香的书，时代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每个人的个性、经历、情趣，也在这本书上尽情浸润着。

谢冕：充满矛盾感的五十年代阅读

谢冕的书，很多是包了书皮的，牛皮纸、塑料纸、彩纸，各种各样的书皮让旁观者猜得出这些年代久远的书在主人心中的分量，谢冕说：“古典文学书，还有工具书我一本都没有扔。”而这些伴随谢冕左右的书，有很多都是大学时

代积攒下的。“它们给我一种满足，也给我一种回忆。”

1955 年，国家号召青年“向现代化科学大进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全面学习苏联。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23 岁的谢冕考进了北大。入学不久，谢冕和他的同学满腔热忱响应着国家号召，但他们也不断接受着批判个人主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一颗螺丝钉等种种教育。谢冕回忆说：“1955 年尽管有‘批判胡风’这些运动，但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学校的学习秩序很好。”

在大学一二年级期间，完成老师的阅读要求是谢冕阅读生活的主线。谢冕说：“我们从先秦、两汉、诗经、汉赋、楚辞到近现代文学的有关作品都读了。”他记得光是游国恩先生讲的《诗经》就发了厚厚的一本，那本小 5 号字、16 开的大书，有游国恩先生的注释，有选文，还有考据。诗经总共 300 首，而谢冕他们至少要深入阅读 80 首。

谢冕和他的同学深感学业繁重，更何况每天还要花掉大量的时间阅读。因此，当他们听说中文系还要加开一门语言课的时候，都很不乐意，学生宿舍里很快炸了锅，大家决定据理力争，一场大辩论于是展开了。

“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语言学”是争论的焦点，辩论中，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阐发的“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后来变成了名言。这个“有机联系”却遭到了学生的反对，谢冕的同学孙绍振，平日就很调皮，他画了一张大字报，画面上有一只大公鸡，脚踩两个墩子，一个写着文学，一个写着语言。他戏谑地称之为“有鸡（机）联系”。当然，这场大辩论最后无疾而终，学生们反对归反对，学还是必须要学。

谢冕经过两年的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其阅读量甚至是现在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都无法比的。不过，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1958年“大跃进”的展开，大学正常的学习秩序也不复存在了。

1958年，在北大校园，学术开始了“大跃进”，也正是这场“大跃进”，让谢冕寻找到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谢冕和他的同学开始编写“革命”的文学史，此举意在“拔白旗，插红旗”，

以革命的文学史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史。“我们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分成先秦、两汉、宋元、明清、近代各个科研小组，大家在学生编委会的领导下找材料，进行仔细阅读，然后讨论写作提纲，再分工到每人去写。”尽管各人有阅读重点，各人写作不同，但每个人都要通读文学史。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大家意外得到了新的阅读体验。

1958年一个暑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就写出了70万字的文学史，该书作为向国庆的献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了第二年，学生们对自己的杰作开始不满意了，准备着手修改。谢冕回忆：

“那时，杨晦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对我们有很多帮助，婉转地提了很多意见。”随后，大家又利用一个假期，从70万字扩展到120万字，1960年，四卷本的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社会上将70万字的第一部（上下册）简称为红皮文学史，120万字的第二部称为黄皮文学史。

谢冕当时是编委会成员，参加过明清一段文学史的编写，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谢冕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并深深地喜欢上了明代袁宏道的小品文。“他的散文小品和书信都不长，

文笔非常好，文章写得非常潇洒。更吸引我的是那种名士派头，他不想当官，喜欢山民，喜欢友情，喜欢朋友之间尽情喝酒。”谢冕觉得自己和袁中郎（袁宏道）之间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对应。谢冕说：“那个时候正处于革命高潮，要求我们放弃自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都要融在集体中去，但是我心里有向往的东西，士大夫的精神和读书人的情怀，在暗暗地影响着我。”

当总结“大跃进”时代的阅读生活时，谢冕认为，这些阅读和周围的环境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在那个环境里，口号连天，每个人要不断压缩自己，但是文学给我们最广阔的、自由的天地。文学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从中得到安慰的。”同时，谢冕也深陷在现实和自我的矛盾中，一方面充满激情地响应党的号召；一方面又迷恋内心的丰富性，这让他甚至有原罪感。“我们太单纯，太天真，但我们又很复杂，很矛盾。我渴望自由，但是周围不让我自由，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不应该这样过。”

除了痴迷于《纲鉴易知录》、《万历十五年》等大量历史书外，大学时代对诗歌的迷恋也影响了谢冕的一生。谢冕尤其喜欢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

他还记得聂鲁达的《葡萄园的风》翻译得很及时，“当时国内流行的语言很枯竭，很口号，很枯燥，但聂鲁达这些诗人有非常伟大的胸怀，有非常自由、活泼的思想，并塑造了非常丰富的形象。当然，聂鲁达和希克梅特还倾向无产者，有着很多让人着迷的地方。”这些诗人的诗歌集，谢冕见到总会买的。

●自话当前阅读：

我当前的阅读兴趣和年轻时代没有多大改变。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比较关注，但是这几年读下来，我感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垃圾，好诗歌也很少。一些诗人和作家的写作故作深奥，故作深沉，看似高深莫测，其实他们的语言像白开水一样，比我们说话还要琐碎。读这些书让我很累，很不开心，也很不愉快。所以，我整理藏书的时候，每次要扔的书也全是这类书。读这些书让我不开心，我干脆还是回到我的古典书阅读上吧。

张颐武：读“硬”书是八十年代的时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我大学时代的书一本也没扔掉，我的图书收藏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建立的。”

张颐武上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是1980年，经历过十年“文革”，从知识稀缺

时代走来，中文系的学生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读书，疯狂地读书。

读“硬”书和看杂书构成了张颐武大学阅读生活的主线。尽管这样，张颐武并不是一个读书很有计划的人，可以说是见一本读一本。精力旺盛的他，常常是一晚上就把一本书读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哲学思潮在大学校园迅速风靡，大学学子们着迷地吸取着黑格尔、萨特、荣格的精神营养，读“硬”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

张颐武住在32号楼宿舍，学校规定晚11点熄灯，但同学们床上的小台灯总会亮到很晚。大三后半学期的一个夜晚，张颐武正在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中关于主仆关系的论述，非常晦涩，有一段已经看了两三遍了，但是始终弄不明白，但再接着看，张颐武突然一下子融会贯通了。“主人和奴隶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得到，在人生和历史中间都能感受得到。黑格尔讲到主人其实是空洞的、空虚的，因为主人已经没什么可追求的，而奴隶是要奋斗的。”张颐武接着想到，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里的很多理论很多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个冬夜，张颐武兴奋不已，他觉得床上的小台灯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

有的中国古典著作很难读，同样被张颐武视作“硬”书。古代文艺理论书《文心雕龙》尽管书里有很多意思，有很多的想法，并不是年轻人容易理解的，但张颐武一直有兴趣读。他说：“读‘硬’书，让我觉得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是在作一种思想的体操，就好像人在跑步的时候，遇到一种高原反应，觉得很没劲儿，很疲劳，这个时候只要熬住了，然后读下去，就有豁然开朗的时候。”而一旦豁然开朗，往后等着你的就是通衢大道。

关于杂书，张颐武更是兴趣广泛，他把看杂书当作是读“硬”书的调剂。

在杂书群里，张颐武尤其对隐秘的历史很感兴趣。像《文史资料选集》，共100多本，是关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很有趣的私人回忆。“在读《精神现象学》之余，拿出一本《文史资料选集》看看，过去老一辈的很多轶事，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对我是很大的消遣，就好像我也参与到了历史中去。”关于军统特务的书也让他感兴趣。当时很流行的《沈醉回忆录》张颐武就看过。到了大学高年级，大量的阅读之后，张颐武突然发现，其实历史中有个最不容易被人了解的时代，就是北洋军阀时代，那是最含糊，最复杂，脉络也最不清楚的时

候。而陶菊隐的《北洋军阀史话》给他很多启发，还有吴佩孚参谋长白坚武的日记也让他读来很是有趣。

北大图书馆，也是张颐武快乐消遣的天地。大学期间，他发现一些旧期刊看起来真是乐趣无穷，“这些旧期刊就跟今天的八卦小报差不多，还有那本369画报，非常好玩。”一些新期刊，像《收获》《十月》《当代》上的小说张颐武都看过。“我们那个时候娱乐少，没有什么游戏可玩，读小说就是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它是一种消遣，一种我们那个时代的娱乐。阅读其实当时就是游戏，也是人生的乐趣。”

“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热烈，讨论甚至能当饭吃。”张颐武笑着回忆道。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描写了女知识分子微妙的情感，该书迅速在北大学生们中间风靡开来，许多同学并没有感情经历，但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大家的争论很激烈。有的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是真正的不道德。”有的说：“破坏婚姻的人是不道德的。”张颐武是开放派的，深信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不仅发表言论，还写文章，认为那种微妙的感情是合理的。“后来再看那时候写的

文章，觉得很幼稚，也很可笑，可是谁不是从幼稚中长大的呢？”

●自话当前阅读：

我现在往往是看最新但经得住考验的书，而且还是爱看杂书，我读的历史、哲学、生物学、人类学方面的书很多，让我难忘的有《崩溃——社会怎样选择成败兴亡》、《小团圆》、《冷记忆》这样一些新书，也有像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等等。虽然我每天时间很紧，但人生有很多间隙，吃饭之前等菜的那段时间，在咖啡馆等人见面的空隙，坐飞机过程中的4个小时，都可以用来读书，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阅读方式。我觉得，只要养成看书的习惯，看书速度也会很快。拿到一本书，我先是泛览，有值得回味、思考的地方再细看。

张一帆：在追慕中享受阅读快乐

“谢冕老师50年代读大学，张颐武老师80年代读大学，我觉得他们那时都有一种属于整个时代的信念。”在张一帆看来，谢冕老师身处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张颐武老师则处于各种文化思潮涌现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代的大学学子阅读吞吐量都极大。“而我们这一代环境更宽松，更注重个性的张扬，阅读也更个性化。”张一帆还认为，当前这一代的学生在精神气质上的

自我定位更多来自于对北大自身传统的追慕，来自于对“五四”以来的老一輩学人的追慕。

和我们想象中的当前大学生的阅读生活不同，张一帆的阅读和时下流行的畅销书很少产生联系，这也和北大中文系不少同学的阅读状态是一致的。

张一帆曾在吉林省吉林市一所重点小学读书，“四年级的时候，我读了余杰的《火与冰》，我突然发现，文学除了美，还有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张一帆也是通过余杰开始读鲁迅，并通过余杰的文字了解了北大众位名师。“今天重读余杰，对于他的很多观点我不能同意，但我永远怀念作为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读到那么多令人激动不已的名字和事迹时的那份心情。余杰最早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影响直到现在。”张一帆的目光透着执著。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北大中文系流传了几十年，但张一帆认为，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偏差。进入北大后，他发现这句话出在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的《北大各院系介绍——三十七年》里，并找到了原文对这句话的解释：“因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绝对不能抛开文学遗产而凭空创作的，所以即使抱着那一种目的而来的学生，也

绝不会感到失望，反而使他培养成更深沉的态度，更虚心的学习。”对张一帆而言，上了中文系，不再只是单纯的作品欣赏，而是对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获得一种专业的视角其实对文学阅读与写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现代文学阅读是张一帆倾心的，他也为自己的喜好找到了理由：“现代文学所在的时代是中国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变局的时代，更何况我偏爱周氏兄弟，从小就喜欢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

鲁迅是对张一帆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家，张一帆喜欢谈论的也是鲁迅的《野草》。“我一直认为鲁迅是现代文学30年里最杰出的诗人，《野草》是散文诗，过去常常作为散文来讲，但我喜欢把它看作诗。这是鲁迅很少见的不那么针对读者，而是针对时代的发言，是写给自己的作品。”张一帆认为，该作体现的是一个内心最为丰富的人的灵魂，一系列自我形象的象征、困境中的种种抉择、“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这些都让人着迷。“鲁迅对自己的反省也促使着我不断反省自己的人生。”

张一帆和他的同学也读过少量畅销书，比如《于丹〈论语〉心得》之类的《百家讲坛》书，但他们往往是将之作为文化现象来阅读的。张一帆婉转地表

达着自己的态度：“老师说，读古书需要两个轮子，一个是考据之功，一个是义理之辨。讲《论语》可以结合当下现实有所发挥，但前提是你必须对孔子的原意有深入的理解，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不能全凭自己的喜好发挥。”不过，最近几年，杨伯峻《论语译注》重印了，杨树达《论语疏证》出版了，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面世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张一帆认为，这些更严肃的著作的出版多少得益于于丹的“开风气”，这是于丹的积极作用，而他自己也从这些随后出版的书中汲取了营养。

每天到图书馆的文学借阅室、人文社科借阅室自习，对张一帆来说是一种幸福。“我读着各种各样的书，享受的是手边有书，俯拾即得的乐趣。”张一帆读书时很少考虑是不是对自己有用，“鲁迅说‘随便翻翻’，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读书态度。”他喜欢沿着一排排的书架走下去，看到感兴趣的就取出来读，“我顺着书架边走边读，收获很大，比想到什么再去找要惬意得多。”

尽管时下网络阅读很是兴盛，但张一帆说：“网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不十分重要。”过去网上流行过一阵“晒工资”，张一帆和

他的同学有时也在网上“晒书单”。“我们每读过一本书都有一个记录，一方面自己记得自己读过什么，一方面也能了解朋友正在读些什么，如果是自己也感兴趣的，就可以找来读一读。”而豆瓣网是小范围的交流，“有时候发现大家都在关注同一本书，就聚在一起聊一聊，像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最近的话题。”（记者 路艳霞）

【三代人难忘的五本书】

《第三帝国的兴亡》夏伊勒著（美）

《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著
（俄）

《袁宏道集》袁宏道著

《艺术哲学》丹纳著（法）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

——谢冕

《语文影及其他》朱自清著

《唐诗三百首》

《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著（法）

《管锥篇》钱锺书著

《知识考古学》福柯著（法）

——张颐武

《野草》鲁迅著

《火与冰》余杰著

《北大精神及其他》陈平原著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

《海子的诗》海子著

——张一帆

记者手记

赶到谢冕教授家的那个早晨，他刚跑完步，还洗了冷水浴，这是他几十年养成的铁打不动的习惯。采访完毕，我和谢教授赶往他北大的书房，老人一路谈笑风生，快乐染人。午饭时间到了，谢教授执意请我吃饭，并大力推荐北大畅春园学生食堂的兰州拉面。不过，面条盛上来的时候，我看着海碗面条傻了眼，谢教授却吃得非常开心，没有剩下一根面一滴汤。那一天，我觉得很开心，我想那是老人家的快乐、幽默和睿智感染了我。

采访张颐武教授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张颐武平日参加各类文化活动，总是快言快语，但是当提到他大学时代的阅读时，他的语速放缓了许多，声音也变得柔和了。我更情愿理解为，他是

想通过这种特有的方式，慢慢咀嚼让他留恋的那一段美好时光。

快乐男孩张一帆很朴实，他倾吐着对北大的一往情深。他告诉我，想读研和读博，他最大的愿望是，像谢冕老师和张颐武老师一样，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采访三代人，发现他们的青春阅读生活因时代不同而大不一样。谢冕、张颐武两代大学生仍然有着阅读的集体文化氛围，其时很多青年学子跟他们有着相似的爱好的，阅读书目也非常接近。张一帆的阅读则未必能引起其他大学生的共鸣，也许只代表了他个人，但这也正体现了在当今更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阅读的选择自由空间更大，也给了年轻人更多张扬个性的机会。

来源：北京日报 2009年

编辑：丁香的耳朵

陈嘉映：写书这事儿我走了很大弯路

5月底在上海，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了陈嘉映教授。这位知名的哲学家一直对出版作品保持谨慎的态度，著译不算多，但都至为精良。年逾耳顺的他着迷

于现象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诸多艰深问题，但在最近出版的《何为美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一书中，他将

目光投向与我们日常生活最切近的伦理学问题。

善恶、知行、快乐与幸福……这些伦理学问题是哲学家与普通人的共同关切和困惑，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吗，能够指导我们更好地生活吗？陈嘉映教授在书中却保持警惕：“上升到普遍”不是思想的归宿，更不是生活的归宿。思想者不可迷恋凌驾一切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更不用说把自己的特殊存在直接提升为普适原理。

这样一种思想与实践间的张力饶有趣味。而在陈嘉映教授自己的生活中，三十年著述生涯自然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迹——在带给人们“真诚的思考”的同时，如何改变了他自己？



以下为澎湃新闻采访节选：

澎湃新闻：一般认为，像如何过美好生活，以及人生的意义之类的问题，似乎不是什么问题，比如海德格尔认为，前现代人不会受这个问题的困扰，而在分析哲学里，也可能觉得人生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是横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思想家，然后您写了这样一本书，也讨论良好生活和人生意义，这挺好玩的。

陈嘉映：分析哲学的确谈这个谈得比较少，不过，分析哲学是英美哲学主流，这些年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的主流议题多半是从分析哲学传统发动的，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罗尔斯，还有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哲学家。当然，不一定是都直接谈“人生的意义”。另外一方面，现象学传统直接谈这些问题也不很多。谁在谈呢？前两年读了一本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写的《人生的意义》。

澎湃新闻：您谈到美好生活要有所作为，感觉其中存在一个矛盾，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本身是实践，但它又是一种危险，您书中也征引维特根斯坦，说“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人生问题也完全没有触及”，是说

要排斥思辨。良好生活是活出来的，不是沉思出来的？

陈嘉映：可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面临这个问题。作为希腊人，他们比较自然的想法是，良好生活是要有所作为，它跟城邦相联系。对希腊人来说，人生跟城邦关系密切，以至于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句话也翻译成，“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是希腊人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来说，对永恒真理的追求至少也同样重要，这种追求是通过“哲学”，通过沉思实现的。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矛盾：到底介入城邦生活是最可欲的生活，还是通过沉思达到真理是最可欲的生活？

我觉得柏拉图的解决之道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沉思达到关于政治的真理，政治的真理可以将城邦引向正确的方向，这是“哲人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两者还是能够统一起来的。亚里士多德不大能够接受柏拉图的想法，他本人区分了理论学科和实践学科，在他那儿，在这个框架里，你不大觉得通过沉思达到的真理能够那样顺理成章地指导我们的城邦生活或实践生活。实践生活另有智慧，就是他说的 *phronesis*，理论获得的智慧则是 *sophia*。这样一来，

理论生活和实践生活哪个更重要，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更难调和。其中一个调和办法是这样：人都不能脱离城邦生活，包括哲人在内，那么，*phronesis* 就是达到 *sophia* 的一个基本条件。不过，很难依靠文本确证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要建立的联系，在这件事上，他的说法有摇摆。

把这些都翻开不说，现代人所面临的情况跟他们不同：亚里士多德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即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区分；现代呢？我们可以跟他相应的就是，简单来说，自然科学的真理和实践真理的区分，这在亚里士多德那时候还不是明确，但现在看起来很明显。我们逐步看到，自然科学所达到的真理，跟我们能否具有实践智慧，是否过上一种良好生活没有内在联系。

澎湃新闻：那么您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知道，经济学从哲学和伦理学脱胎而来，但现在很多时候却更像一门自然科学了。人们慢慢接受经济学跳出本学科，来解释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包括人生问题，并且往往发现还很有意思。

陈嘉映：任何一个学科发展壮大之后，都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希望能给出一个更广泛的解释，于是从本领域向别的领域发展。此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

当一个学科变成一个热门学科之后，会吸引很多卓有才智的人，这些卓有才智的人不会局限于传统学科领域，会有更扩大的眼光。所以近百年来，关于整个社会和人生的重要理论，实际上有很多就是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提出的，像熊彼特、哈耶克等等，这些大家都熟悉。还有例如阿玛蒂亚·森，他的研究本来处在经济学的边缘领域，已经跟社会学政治学领域交集。这些人卓有才智，他们把整个社会纳入到自己的眼界中来，这本身是自然的倾向。反过来，包括哲学在内的一些传统学科，如果吸引不到第一流的才智，即使还在谈这些大问题，也可能谈得毫无意思，所以大家情愿去读经济学家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生活的解释，而不愿读哲学家的书。

但是当经济学家在谈论整个社会生活的时候，他可能采取一种经济学的技术主义态度，也就是他用比较狭隘的概念工具来解释整个社会生活，把整个社会生活收缩到狭窄的视野里来。但是完全可以像熊彼特那样，他并不是“帝国主义”，虽然他的本职身份是个经济学家，但在谈论社会生活的时候，他并不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谈，而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他叫作“哲学家”，虽然这个名号也没有太

大意义。就像弗洛伊德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他自称是从事心理学科学，但我们知道，作为心理学科学，很多内容站不住脚，而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谈论得不好。

经济学本来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一个维度，即经济维度，至于研究的方式呢，为了达到科学的目的，会逐渐使用抽象的态度和方法来推进这门学科。经济这个维度本来是交融在人类生活中的，现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一个界限分明的学科领域。比如说讨论离婚的时候，可以单从经济角度讨论财产该怎样分割，但谁都知道，夫妻各自为家庭做出了多少经济上的贡献，这是算不清楚的。

澎湃新闻：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如何讨论道德伦理？

陈嘉映：经济生活，或者说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变成国家越来越突出的目标。在观念和价值多元化的世界，由国家来提供我们个人的生活准则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国家的统一力量，本来很大程度上用来培养和保卫一种生活方式，现在逐渐转化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公认的目标上面，所以我们以前说的伦理啊道德啊这些东西，就慢慢从国家的指导范围中剥离出来了。读书

人如果把自己设想成民族国家的理论家,尝试为广大人众提供道德伦理标准,也随着这种新情势,变得不那么靠谱了。当然,在生活中道德伦理并没有消失。如果它真的从生活中消失了,那任何探讨或重建也没用,就变成了无本之木。在这点上,读书人不能把自己的角色想得太重要。一个 modest(谦虚)的想法,读书人的首要任务是看看伦理道德现在在实际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在大家的反思中是什么样子的,对伦理道德的初级反思出了哪些差错。我甚至觉得,除此之外,读书人所能做的并不是太多,也不该要求他们做太多,因为社会真正的更健康的发展,是全社会的事,读书人所能做的很有限。



澎湃新闻:坊间流传您那个著名的“三步走”哲学时间表:第一步做语言哲学和本体论;第二步是知识论或曰科学哲学;最后抵达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现在您写了一本伦理哲学著作,那么下一本书将会谈政治哲学?

陈嘉映:没有下一本书了。这是最后一本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

陈嘉映:岁数大了,要退休了。著书虽然没有年龄限制,但对我个人生活来说,我觉得良好生活就是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我到了老有所安的时候了。

澎湃新闻:这个“三步走”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说的吗?

陈嘉映:大概是周濂、陈岸瑛几个学生采访我的时候说的。大概在 1995 年的时候。当年回国之前跟人聊天,我说,觉得自己可以回国了,现在可以给人上课了(笑),感觉有值得对年轻人一说的想法。回来没多久,周濂他们来采访了,这是第一次接受采访,但在我印象中,是最成功的一次采访。他们问到我的工作计划,当时我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工作计划,只是觉得自己大致会这样展开自己的工作。到现在已经 20 年了,在这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对写书不满多过

满意。我不能说完全不满，书出了能卖出去，有人在读，我也挺高兴的。但从我自己来说，不满多过满意。写书这件事本身就不见得好，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更不是表达我想法的最佳途径，一本一本本地出书，我是觉得走了很大弯路的。

我现在的想法是，出书呢，我可能还出两类的书。第一类呢，是我以前从来就不愿意出版的东西，比如谈谈历史啊思想史啊什么的。谈这些事情，我自觉有点心得，但我不是专家，只是个爱好者，聊天的时候我什么都敢说，但是要写文章出书，就觉得有点夸张了。现在我的想法有点儿改变，因为不少人听我谈这些觉得好玩，有意思，所以觉得也不妨印出来，出本书，有人爱读，你又不是在胡说八道在误导他。

写书的一个问题是，写书难免求全，面面俱到。我已经不是很求全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再少求全一点，可能会做得好一点。就我真正读得更多的、思考得更多话题，再稍微深入一点，写三五篇文章。如果这三五篇文章可以结个集子，那就出这种书。我谈过一些话题，原以为这些话题展开挺有意思的，也许有年轻人把它们接过去，做更深入的探讨。但好像没什么年轻人有兴趣接过去

做。那我要是还没老到什么都干不了，我就自己在其中挑两个题目做做。

澎湃新闻：政治学中哪些吸引您？

陈嘉映：反正不是政治哲学理论。我烦政治理论，翻来倒去的，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觉得做政治学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一段政治史，看看它有哪些让人困惑的问题，比如说去看看国共之争，为什么是共产党胜出呢？这里有好多原因，突出的是军事方面，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包括政治维度。当时，共产党的政治有优势吗？若有，这种优势从哪里来的？把国共之争的政治因素梳理清楚。从中能够得出什么教益？再比如，你要研究民主政治，那就去看看这几十年来民主转型国家打开了什么局面，带来了什么苦恼，然后再反思这些东西，反思到什么层面都行，但千万别从原理出发。

来源：共识网

编辑：令狐冲

好文共赏

李猛：人文教育要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好人难且值得（二）

澎湃新闻：中国人被解放到现代社会之后同时还保留着家的观念，这个处境和17世纪的鲁滨逊有没有相似之处呢？

李猛：鲁滨逊这本书里，家的主题是相当弱的。在第二部中，鲁滨逊专门带了一批英国女人回到荒岛上，帮留在上面的人们建立正常生活。其中一个聪明人，在轮到他去挑时，一眼就看中了这批“货”中最好的一个。这种将家庭关系理解成经济安排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我们真正对家庭的理解，也不是西方人对家庭的主要理解。我觉得中国人和传统的联系，大都还是保留在家庭里的。我们四五十岁这一代，一方面有传统的家庭角色，比如在和双方老人的关系上，一般夫妇双方都是共同想办法解决的；另一方面感情上又是比较偏西方的，结合不再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基本都是自由恋爱。家庭同时包含了情感、经济生活等多种角色，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社会的命运可以看出，我们既面临自己的传统，又面临鲁滨逊式的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挑战。

我自己做伦理学的感受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大的问题就两个：一个是政治体制的变化，一个是家庭秩序的变化。现代中国早期那些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大多与家庭这个主题有关，政治方面却好像没有形成影响可以相提并论的作品。曹禺的《雷雨》与巴金的《家》，当时影响多大；包括鲁迅的《伤逝》、《祝福》，郑振铎的《家庭的故事》与老舍的《四世同堂》，都和家庭秩序的变化有关。家庭是中国人感受生活方式变化最强烈的部分，这证明所谓家国之痛，家的痛和感受是每个人最直接的。政治上虽然是皇帝变成了议会，议会又变成了新的国家，但是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还是比较遥远，比较间接的。

我写《自然状态与家庭》时，谈的是中国人感受最强烈的一部分，而西方人对这个自然状态理论感受最强烈的是女性主义。在《利维坦》、《政府论》、《爱弥儿》、《社会契约论》中，一方面好像暗示男女差不多，但另一方面又要建立一个夫权制的家庭。女性主义关

心现代自然法学派对整个男女关系的重新改造，以及它隐含的无法摆脱的传统社会中夫权制结构的影响。但中国人无论是不是女性主义者，都会觉得家庭还是最根本的，所以中国人会比较直接地看到家庭是变化最大的部分。



《自然社会》一书的封面与封底都来自于李猛喜爱的马奈作品，封面是一群人在大海中漂流，封底则描绘了停泊着船只的港口

细读《自然社会》：从亚里士多德到今日世界的精神困境

澎湃新闻：在全书上篇“自然状态”中，您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存在”到霍布斯式社会的构成。为何这部分成为您用功最深的部分？

李猛：这本书我比较早做完的其实是第二部分“自然法权”，标准的自然法研究，一些基本的想法在我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形成了。而第三部分“政治社会”是借助自然法权建立的政治社会的各种形式，主要的想法在我研究洛克和霍布

斯的过程也逐渐明确，当然这部分现有研究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只不过，在对现代国家的规范性质及其困难，这一部分的研究希望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我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探究自然法如何提供了理解现代社会、或者说中国人现在所面临根本处境的关键所在。我越来越感到，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特殊之处在于“自然状态”这个概念。在古典自然法或中世纪自然法传统中，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概念一直有，从希腊化时期到中世纪晚期都有大量相关论述。但是自然法权的讨论并没有被结合成“自然状态”这一人性概念，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完全代替政治哲学的研究的原因就在这里，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可能有些概念一直在用，但用法各个时期并不一样。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用过“自然法”这个概念，但他们和托马斯、奥康、霍布斯使用这个概念时谈论的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用词的连续性掩盖了哲学上的根本差别。

我最初是学习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不讲“自然状态”，倾向于认为人性是社会历史的建构，但实际上这个思路正是来自自然法的人性论。我觉得“自然状态”这个概念其实才是理解全部现代自然法学说的焦点，所以《自然社会》一书的上篇就是去重新梳理“自然状态”学说的

人性论意涵，分析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这一人性论提供了对生活方式的何种独特理解。上篇的整个思路确定后，后面这些年的具体研究才有了新的基础和视角。所以上篇我写的比较用心，这也是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并非天然“自然状态”中敌对和孤立的个体。我就用了一节去讨论他所暗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霍布斯的传统中则比较强调“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敌对的战争状态；而格老秀斯的传统中则认为，即使没有国家，人也可以建立一个和平的秩序。在自然法学说史上，有人认为格老秀斯的观点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现代继承，但我觉得不是，他和霍布斯的思想在概念上其实是有某种一致性的。

这种一致性，就是我说的现代“自然状态”学说背后体现出的人的自然社会性概念，这是和古典的自然政治、和中国人讲的人伦的政治秩序、家国秩序都不同的一种现代观点。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解现代自然法学派比较关键的切入点：“自然状态”明确地描述出，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人类自然社会性的关键是人的自爱和基于其上所构成的各种联合关系。在鲁滨逊所在的社会中，个人是孤独的，他虽然需要同伴，但他的每个

同伴也是同样孤独的。而在古典传统中，人基于人的德性所建立的统治关系里是有一个共同体的，所以亚里士多德会得出“自然政治性”的概念。中国人从讲孝悌开始的人伦关系，构成情感方式和统治权威的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与此原理相似但有不同。“自然状态”其实是种很新的、但也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的存在方式。

西方社会在这三百年中，慢慢挣扎着形成许多复杂的制度，去调整“自然状态”，使其成为人们可以生活的社会关系。中国把西方三百年的历史压缩在二三十年里，因此我们对自然社会性带来的许多问题有着强烈的感受，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危机、权威危机、信念危机等，都是这三十年剧烈变动的结果。美国建国时，有些人希望人人平等，有些人不能接受。美国花了一两百年，通过内战和民权运动等方式慢慢去消化这些冲突——其实到今天许多有些问题也没有完全被消化。在福克纳的南方小说里，我们能看到，美国人其实也经历过社会对抗的痛苦。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家庭、政治、社会、理想，甚至个人感情全部叠加在一起，共同面对来自鲁滨逊世界的挑战，因此会比西方人有更强烈的感受。而且，中国人并不是简单地在重复西方的历史，重复西方人的生活，

我们对现代的挑战和困境有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对现有的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后，产生了新的理解和新的思考。

来源： 澎湃新闻

史苑钩沉

金克木：缅怀落叶

徐迟和我做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彼此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同的只是题目，这就够了。两人的话一样，还有什么可谈？彼此都听到不同的话，增长了知识，磨练了意志，这样才能彼此都开心，也得益。

傅斯年叼着大烟斗

1939年我以意外机缘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期到昆明时便去访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他给我一张名片，介绍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开门见山，没几句便说到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我打断他提出一位教授。他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我才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

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他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忽然问我：“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我连忙推辞，说我的德文程度还不够用作工具去学另一种语文。用英文、法文还勉强可以，只是湖南大学没有这类书。他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过些时，他又说要送我学希腊文的德文书，极力鼓吹如何好，又被我拒绝。我说正在读吉本的罗马史。他说罗马史要读蒙森，那是标准。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

忽然布幔掀开，出来一个人，手里也拿着烟斗。傅先生站起来给我介绍：“这是李济先生。”随即走出门去。我乍见这位主持安阳甲骨文献发掘的考古

学家，发现和我只隔着一层白布，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傅回屋来，向桌上放一本书，说：“送你这一本吧。”李一看，立刻笑了，说：“这是二年级念的。”我拿起书道谢并告辞。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不学希腊，就学拉丁，总是非学不可。这也许就是傅的著名的霸道吧。我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越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那么长的“间接引语”，颠倒错乱而又自然的句子，把自己当做别人客观叙述，冷若冰霜。仿佛听到恺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争报告：“我来到了。我见到了。我胜利了。”全世界都直引原文，真是译不出来。

读时每告一段落，我便写信给傅，证明没有白白得到他的赠书，并收到复信。

这本拉丁文书，在我和书本“彻底决裂”时送给了一位女学生，到我和书本恢复关系时她又还了我。如今这本书还在书架上，使我忘不了送书的傅先生。

何容教授

何容（谈易）教授在抗战时曾以“老谈”之名与“老向”（王向宸）、“老舍”（舒舍予）并称通俗文艺“三老”。

何容原是他的笔名，不是在北京大学时的“学名”。他的第一本书《政治工作大纲》署了这个名字。书的扉页后有一张照片，是作者的半身军装像，军帽、武装带俱全，还题着几句诗。末两句是：“这是从前的我，莫作现在的看”。又印着一方图章：“何容谈易”。这本北伐纪事的书被当时提倡幽默的林语堂看中了。在他编的《论语》杂志上当作幽默作品用幽默笔调一介绍，何容这名字顿时成为幽默作家。

我看到他时是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内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他在黎锦熙、钱玄同两位教授手下当一名工作人员。我是去找只有二十岁的世界语者周达甫的。已经快中午了。忽然从相邻的一间屋里开门探身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人，说：“你们谈什么这样起劲？把我吵醒了。昨晚看篇文章直到天亮才睡。原想睡到下午，现在睡不成了。”这人便是何容。问他看的什么书这样吸引人。他回答说是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考》。那时不但《观堂集林》早已出版，《王忠愍公遗书》也出来了。但那些开辟学术新天地的文章还没有多少人认真读过而且认识其价值。我听了，还以为“幽默大师”说这话是把考古论文说得像小

说，又是幽默呢。不久，他就到北京大学教起“国语语法”的课了。

再一次值得记的会见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我到了武昌，听说何容和老向在编冯玉祥主办的《抗到底》杂志，便去找他。那可能是冯将军的临时官邸。他接见我是在一间不知是客厅还是门房的屋子里。他要我给那刊物写点宣传抗战的文章。随后，一九三八年，我由曹未风介绍在香港《立报》萨空了手下当国际新闻编辑。知道《抗到底》还在重庆继续抗下去，曾寄去过两篇文章，都登出来了。

一九四〇年我去重庆时赶上了大轰炸，是否还见到他，记不清了。那正是“三老”忙于抗战通俗文艺的时候。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到北京大学来，见到从台湾回来的魏建功教授，才知道“谈何容易”到台湾推行国语去了。

少年徐迟

徐迟比我小两岁，三十年代初期，我们都向《现代》杂志投新诗稿。主编施蛰存先生来信介绍，徐迟正在燕京大学借读，从郊外来城内和我见面，从下午谈到晚上，还请我吃一顿饭。以后他南下回东吴大学，见面只此一次，做了几年通信朋友。

他上教会大学，西装革履，一派洋气，又年少气盛，一心革新。我是蓝布衫，不学无业，在古书底子上涂抹洋文，被朋友称为小老头。我们一谈话，处处是共同题目，共同兴趣，又处处是不同知识，不同见解。彼此都像发现了新天地，越谈越有相见恨晚之意。

1936年春我到杭州。他来信邀我去南浔他家。他已是大学毕业教中学在家奉母了。于是拱宸桥下搭船，当天下午在蒙蒙细雨中我由他接到家中。老母亲一口南浔话，和我讲彼此听不懂的话，猜错了，徐迟在旁大笑，好像看到错得可笑的翻译。

我当时翻译《通俗天文学》，还缺一些，便坐在沙发里续译。徐迟给我一块小木板放在沙发上架着。我便伏在板上译书。他爱听音乐，有一些唱片。他对我的天文不感兴趣。我对一窍不通的外国音乐倒很想知道。他便滔滔不绝对我谈论。我说，我不懂天文，看书懂了一点便译出来给和我一样的人看。你懂音乐，何不把对我讲的这些写出来给我这样的人看。我在他家住了大约一个月，译完了《通俗天文学》。他开始写介绍音乐的书。我们的书以后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真是少年胆大，敢讲自己不

懂的话，做自己不会的事，写自己也不知道明白不明白的文章和书。

徐迟和我做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彼此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同的只是题目，这就够了。两人的话一样，还有什么可谈？彼此都听到不同的话，增长了知识，磨练了意志，这样才能彼此都开心，也得益。

有不同才能结合长久而有味。清一色就是清汤，索然无味了，朋友，情人，夫妇，不都是这样吗？

人世流星侯硕之

侯硕之——这是我只见过两面而终身的不忘的朋友。

“硕之性格孤僻，不好交际，没有多少朋友。他对我说过的朋友就是你。听说你们在清华园看星谈了一夜，你为什么不为他写点什么？”硕之的哥哥侯仁之对我说。

我也记得侯硕之。我们总共只见面两次。第一次在清华园，他还是学生。第二次在昆明，他已经工作，只在茶馆里谈了不多的话。随后过了没有几年，我听到传说，他在去西北的路上遭遇土匪，不幸被害了。

三十年代初期，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一本新书传到中国。这书用通俗文笔描述天象又解释宇宙膨胀学说。不约而

同有三个人翻译。一是南京天文台的人，译出书名是《闲话星空》，商务印书馆先出版。一是侯硕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生，译出书名是《宇宙之大》，开明书店接着出版。第三个是我，照原书名译作《流转的星辰》。

我的朋友沈元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两个译者都是我的朋友，你们也作个谈天文的朋友吧。我来介绍。”

暑假刚开始，我收到清华大学侯硕之来信，约我去清华观星谈天。

在清华宿舍的一间楼房里，我告诉他，我没学过数学物理。他笑了，说：

“我现在学工程，在高中可是学文科的。仁之学的是理科。考大学时我们两人颠倒过来了。他进燕京历史系，我进清华电机系，你猜我入学考试高级数学得几分？两分。”他又说：“考大学时我想，得学点实用的东西。中国将来不管怎么样都需要发展电力工业。没有电，什么都谈不到。只要不亡国，就要有电。没有电，迟早还会亡国。不管清华电机系有多难考，我也要进。进时赶了一下没学过的数学，考试居然得了两分。这也许是看我答卷用英文的面子。”他笑了。真是天真而有志气的人。他又为什么喜欢天文？

“我进工科，还是喜欢文科。理科中的文科就是天文。”我懂得，那时日本军阀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为了国家，他弃文而学工但兴趣仍在文，那就是天文。

说着话，黄昏已到，他拉我下楼，介绍清华园几处“名胜”，终于到了一座塔形建筑边。他说：“这是气象台，算它是天文台吧。上去在天文台观天象吧。你看，那颗明星出现了，是木星。金星此刻不在太阳这一边。”

于是我们进行谈“天”了。我们坐在地上，在灿烂的北天星空下，谈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见到光辉的北落师门星和南极老人星。

那一夜，我们谈天说地讲电力，把莎士比亚诗句连上宇宙膨胀、相对论，谈中国和世界，宇宙和人生，文学和科学，梦想和现实，希望和失望，他不掩饰自己的抱负和缺憾。我的倾听表明我

的佩服。他又说又笑，我真看不出他平时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我在昆明再见他时，他已经毕业，在一个什么机关里工作了。那正是欧战爆发后不久。他完全失去了在清华园时的兴高采烈的气概，一副严肃而有点黯淡的面容使我很吃惊。他说，天文不谈了。在西南开发水电也没什么指望了，不知怎么才能为抗战出点力。我只觉得他和先前那位大学生真是判若两人了。

在“宇宙之大”中，一颗流星的闪过，不论多么显耀，也是极其渺小的。在中国之大中，一个极有希望的青年中途夭折也是非常微末的。但是在逝者的亲人和好友的心中，不论流星的放光时间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它是永恒的，不会熄灭的。

来源：《倒读历史》

作者：金克

大美北大

燕园花事 昼颜



学校的旋花科植物有四种，牵牛和圆叶牵牛开在秋季，夏天开的，则是田旋花和打碗花。要区分这两种花，专业一点的做法是看叶子，田旋花的叶子细

长，打碗花的则要宽大一些。偷懒的话，看看花也能分，打碗花的颜色较浅，田旋花则比较红，花也显得比较圆。



田旋花



被称作昼颜的，是打碗花。《虫师》里有种虫，爱将卵产在昼颜花里。人只要一闻这种花，便被寄生，从此体内的时间被虫同化，朝生暮死，第二日又醒转，周而复始。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花朵盛开，

花朵凋谢。太阳再次升起，花朵再次盛开，然而今天的花朵，已非旧识。

来源：微信号 燕园每日话题

摄影：Yanz（文中照片均摄于北大校内）

学员心声

北大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

大家好！我叫卢传义，是一名来自海南琼海的中级会计师，现在业余备考注册会计师。进北大读财务管理专升本前，我读的是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电算化函授大专。北大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在我很久以前就想体验的一个梦想，为了完成能进入北大学习，听北大老师讲课的梦想，我整整等了十年，才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北大的继续教育学院学习。如今，四年过去了，我终于要毕业了，离开北大母校前，与大家聊聊我在读北大这几年的一些感想和学习体验。

进入北大学习前，我一直都是一个有着很旺盛的求知欲，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心的人。进北大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原先的想法和做法都太泛泛了。如果按照我原先的想法，什么都学一点，什么都知道一点，那一生只能是一事无成。知识是学不完的，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从工作中和生活中体验自己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再有重点的去学习和钻研。所以，我在北大学习的过

程中特意加强了自己专业技能的业余学习——取得了中级会计师职称，并对注册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的课程都进一步学习，目前正在注册会计师的备考准备中；并初步制定了自己未来十年的职业发展规划，就是在争取考取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和税务师资格和后，再进一步努力，考取美国的注册管理会计师(CMA)资格，让自己能以一个国际化的视野来做好自己的本职财务工作，以积极应对未来十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需要。

而在北大专升本课程的学习中，我最大的体会是北大的老师的专业，无论是基础的英语，计算机，邓小平理论等课程的学习，还是经济学类课程的学习，都让我收获很大，不仅加强了我基础的通用技能，还对我的财务管理专业课技能都有很大的拓宽和加深。拿《微观经济学》的学习来说，让我更明白了做为一个理性人合理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对于社会的促进作用，从而能更多的在工作和生活中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从对方的角度来

考虑，以尽可能达成让双方都能共赢的结果———这样的做法让我收获很大，不仅收获了婚姻生活的幸福和协调，还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收获了很多真心的朋友。而《财政学》的学习，让我能进一步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理解了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并清晰的认识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增强了做好本职财务工作，正确而规范地纳税的工作意识。让我收获最大的还是《管理会计学》的学习，北大老师的授课和答疑，让我以前进入中央财经大学学习时候一直没弄懂的难题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掌握，对于我未来可能作为一名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为公司的决策提供信息和意见实在是帮助太大了。

说了那么多，还要提一下我在进入北京大学财务管理专升本课程学习后怎么协调好工作和学习以及生活的问题。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一下我的家人，是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顺利完成北京大学的学业。而我平时在面对工作、生活和学习的矛盾时，首先确立原则是：第一，工作要先保证做好；第二，保证好自己每天一定的学习时间；至于其他的，则是视紧急和需要情况来协调安排了。其实，我所做的

财务工作和财务管理课程的学习，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工作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北大财务管理课程的学习则是一个对工作技能的学习、思考和拓展的过程，即“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行（实践）则怠”，工作虽然很累，但是能应用到自己每天学习思考的知识，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自然就不会觉得有什么辛苦了。所以，我的学习是快乐的，工作也是快乐的，生活比较平静。

我是一名很普通的海南职业妇女，曾经因为生活中的各种打击身患疾病而使得原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业未能完成，如今有机会能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财务管理专业，是我一生的荣幸！也为我的未来带来了新的职业梦想和希望！而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在北大老师以及同学、家人、朋友的支持下个人努力奋斗才获得的。如今毕业在即，我也将踏上新的征途。在此，向所有的北大老师和同学说一声：“谢谢你们，帮助我成就我的今天和未来！”也祝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工作更上一层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作者：卢传义

海南商职中心

2011 秋财管专升本